

CAMBRIDGE

剑桥政治思想史丛书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康德 政治著作选

[英] H.S.赖斯 (H.S.Reiss) 编

[英] H.B.尼斯贝特 (H.B.Nisbet) 英译

金威 中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剑桥政治思想史丛书 ……



康德政治著作选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英] H.S.赖斯 (H.S.Reiss) 编

[英] H.B.尼斯贝特 (H.B.Nisbet) 英译

金 威 中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 北京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康德政治著作选/(英)赖斯编;金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620-4827-5

I. ①康… II. ①赖… ②金… III. ①康德, I. (1724~1804)—政治思想—著作
IV. ①D095.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8651号

- 出 版 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邮寄地址 北京100088信箱8034分箱 邮编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524(编辑部) 58908334(邮购部)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3.875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康德政治著作选)

ISBN-13: 9780521398374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1991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13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 - 2013 - 0233 号

献给托马斯、理查德、阿诺德与马库斯
(To Thomas, Richard, Arnold and Marcus)

第二版序言

ix

继《康德政治著作选》的第一版首次在将近20年前的一个较早的系列中出现之后，剑桥大学出版社与《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新版的编辑们又盛情邀请我编纂其第二版。他们还同意为这一卷增加三篇文章，但选定哪些是最适合的文章却很困难。入选的三篇文章——《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观念〉书评》、《人类历史的起源猜想》及《何谓在思考中确定方向?》——就“政治的”这个词的狭义用法来说，并不能算作政治著作。不过，它们确实为第一版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著作提供了一个背景，因为它们阐明了康德对理性思考的批判方法以及他对公开运用理性（the public use of reason）的态度。在他看来，缺乏这些就无法达到政治的正义性，这一点在《何谓在思考中确定方向?》一文里极清楚地体现了出来。它还将读者引领到了康德政治观的道德基础方面，而其余两篇文章则刻画了康德的历史观念——他政治思想的另一支柱。我很遗憾篇幅不够，以致不能将第一版序言中提到的其他与政治有关的文章包括进来。或许将来篇幅的限制会不那么严格，那时康德所有涉及政治的著作——包括整本《权利理论》在内——都能在以后的版本中付印。

为了节省印刷成本以便学生们买得起此书，对这本书的第一版不能进行实质性地改动。为此，我的序言本身就不幸

地不能被修订和扩展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增加一篇后记，来说明过去 20 年来在对康德政治思想的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我也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参考文献和更新的索引。

我要感谢巴里·尼斯贝特 (Barry Nisbet) 翻译了增补的文章，而他的评论和校对手稿也给予我无价的帮助。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杰米·麦诺特 (Jeremy Mynott) 和这个系列 X 的编辑们让我编纂这本书，并感谢理查德·费舍 (Richard Fisher) 和苏珊·比尔 (Susan Beer) 在出版过程中帮我审阅了手稿。我还非常感激如下这些人有用的建议：布里斯托尔大学 (University of Bristol) 的同事威廉·多伊乐 (William Doyle)、史蒂芬·科尔纳 (Stephan Körner) 和尼尔·拉德 (Niall Rudd)，约克大学 (University of York) 的皮特·尼克尔森 (Peter Nicholson)，埃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Essex) 的奥诺拉·奥奈尔 (Onora O'Neill) 以及罗彻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的列维斯·怀特·贝克 (Lewis White Beck)。我理所当然地对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为我在海德堡大学 (Heidelberg University) 图书馆的工作提供的资助怀有感激之意。注释和参考文献提到了很多关于康德的著作，很遗憾我只能对其中一部分的作者表达我的谢意。所有纰漏由作者本人承担。

H. S. 赖斯

布里斯托尔/海德堡

1989 年秋

第一版序言

xi

据我所知，这本书是第一本囊括了康德亲自发表的所有政治著作的英文版。这里收录的几乎所有篇目此前都有英译，因此尼斯贝特（Nisbet）博士请我转达他对这些英译者的致谢，尤其要感谢约翰·拉德（John Ladd）教授翻译了《权利的形而上学要素》（*The Metaphysical Elements of Rights*）[《正义的形而上学要素》（*The Metaphysical Elements of Justice*），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纽约/堪萨斯城（Kansas City），1965年]。这本书是为了将康德的政治著作介绍给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以及政治学理论专业的学生们。至于对康德的一般性介绍，学生们莫过于从阅读史蒂芬·科尔纳的《康德》（*Kant*）袖珍版[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哈蒙德斯沃斯（Harmondsworth），美德赛克斯（Middlesex），1955年]中受益更多了。

本书只包含了那些明显地涉及政治理论并且是他本人发表过的著作。我没有收录如下这些仅与政治擦边的著作，它们是《人类历史的起源猜想》（*Mutmasslicher Anfa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万物的终结》（*Das Ende aller Dinge*）以及康德对J. G. 赫尔德（J. G. Herder）《观念》（*Ideen*）的书评。不过，我收录了《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中的一个虽简短却必不可少的段落。为了与这个系列

的主旨保持一致，我没有收录任何散论，除非它们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整体。康德发表的其他著作中的一些段落被舍弃了，因为它们没能为他的政治理论增添实质内容。我决定收录《理论与实践》（*Theory and Practice*）的第一部分“论俗语：这在理论上也许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行不通”（*Über den Gemeinspruch: Das mag in der Theorie richtig sein, taugt aber nicht für die Praxis*），因为它对伦理学有所贡献。既然本书并不打算成为康德政治著作详细的评述版，我就没有遵循以前处理《道德形而上学》（*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及《学科之争》（*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形成的惯例。完整地收录这两部著作将不可避免地减少人们对本书主旨的注意力。我希望这个关于舍弃掉哪些著作的简短介绍能够使读者得知本书处理方法上的一些倾向性。除了《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一些附加段落之外，我还舍弃了康德其他大部头著作，诸如《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和《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ssen Vernunft*）中论述政治的全部段落。我也没有收录《权利的形而上学要素》（*Die metaphysischen Anfangsgründe des Rechts*）中的一个简明的附录。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任何实质内容被遗漏掉，因为康德只是重复了他在其他地方说过的论点。读者如果想研究《道德形而上学》中那些被舍弃的部分，可以参考约翰·拉德（John Ladd）在《正义的形而上学要素》中那值得称道的译文。至于《道德形而上学》的第二部分“德性的形而上学要素”（*Die Metaphysischen Anfangsgründe der Tugendlehre*），读者可以参考德语原文，这不管怎样也适用于阅读《学科之争》。即使不得不学习德语，参考原文也总是最好的学习路

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译文不能够充分地传达原文的意思^[1]。我也不打算收录对康德政治著作的初步研究成果——譬如在他著作的学院版（*Akademieausgabe*）第22卷和第23卷以及《康德研究》（*Kant-Studien*）1959/1960年第51期中的内容，也不会收录上述这些版本的第19卷和第20卷中他关于政治与法律的笔记。这些著作在康德去世后出版，而他实际上并没打算发表。与他已发表过的著作相比，它们也没有提供不同的内容。它们经常是重复性的，因为许多都是粗简的笔记、对他讲授法律理论课程所使用的课本的评论 [见戈特弗里德·阿肯沃尔（Gottfried Achenwall）的《自然法》（*Ius naturae*），哥廷根（Göttingen），1755~1756年] 以及他关于讲座或晚期出版物的笔记。很难确定这种材料能够占据多大的重要性，因为此后深思熟虑的作家能够轻易地反驳它所包含的观点。从康德的处境来看，这些笔记或许偶尔澄清了他的一些观点。更进一步，它们甚至能使我们洞见到他政治思想起源与发展的线索。后者已经被乔治·乌拉克斯（Georges Vlachos）在他对康德政治理论的研究《康德的政治思想：秩序的形而上学与进步的辩证法》（*La Pensée Politique de Kant. Métaphysique de l'ordre et dialectique du progrès*，巴黎，1962年）第xx页和第590页中详尽地讨论过了。然而，康德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仍然是一个难题，因为尽管学院版的编者倾心竭力地工作，他们还是发现很难精确地确定许多笔记的写作日期。

xiii

最后，我想感谢所有在编纂本书时帮助我和鼓励我的朋

[1] 除了第135、138~140、164页一些段落的缩进格式（大概在原文中是为了强调）我们不能够照搬之外，本书译文在风格和内容上都尽可能地仿效原文。

友和同事。我要感谢我以前在伦敦经济学和政治学学院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的同事和朋友们: 恩尼斯特·盖尔纳 (Ernest Gellner), 莫里斯·金斯贝格 (Morris Ginsberg), 已故的哈罗德·拉斯基 (Harold Las-ki), 威廉·皮寇斯 (William Pickles), 朱丽斯·古尔德 (Julius Gould), 唐纳德·马克里 (Donald Macrae), 迈克·奥克肖特 (Michael Oakeshott), 卡尔·波普爵士 (Sir Karl Popper), 已故的威廉·罗斯 (William Rose), K. B. 斯迈利 (K. B. Smellie) 和 J. O. 维斯多姆 (J. O. Wisdom)。我极大地受惠于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史蒂芬·科尔纳和皮特·布鲁姆海德 (Peter Bromhead), 他们待我很好并阅读了导言。承蒙同一所大学的大卫·艾希霍尔茨 (David Eichholz) 好意, 康德的拉丁引文得以译出。我还从海德堡大学的迪特·海因里希 (Dieter Henrich) 对康德的思考中受益良多。非常感谢都柏林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的丹尼斯·多诺修 (Denis Donoghue), 弗吉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Virginia) 的欧文·艾伦普莱斯 (Irvin Ehrenpreis), 麦基尔大学 (McGill University) 的雷蒙·克里斯般斯基 (Raymond Klibansky), 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at Buffalo) 的乔治·列文 (George Levine) 和欧文·莫赛 (Irving Massey) 以及威斯康星大学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的菲利普·哈特 (Philip Harth), 因为他们慷慨地帮我查考了一些引文。我尤其要感谢 H. B. 尼斯贝特博士, 他不仅承担了翻译康德著作的可敬任务, 而且花费了很多时间校对注释和参考文献, 他还在审阅我的导言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此外, 他还在出版过程中帮我审阅了整部手稿。相应地, 我也认真审阅了他的译文。M. L. 泰勒 (M. L. Taylor) 夫人、

露丝玛丽·怀特 (Rosemary White) 夫人和 B. 格尔奇 (B. Gertsch) 小姐完成了打印手稿的艰难任务, 为此我要对她们献上诚挚的谢意。在洛克菲勒基金会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的资助下, 我得以远离麦基尔大学长达一年 (1962~1963 年), 关于康德的许多工作正是在这个假期中完成的。我很感谢上述两个机构使我有可能在欧洲度假以从事研究。当我结束本书的工作时, 我又一次来到了麦基尔, 这次是离开布里斯托尔大学作为访问教授来度假的, 这真是一个巧合!

所有纰漏由本人一力承担。

H. S. 赖斯

蒙特利尔市麦基尔大学休格森楼

(Hugessen House,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1968 年秋

前 言

伊曼努尔·康德于1724年4月22日出生于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 [Königsberg, 今加里宁格勒 (Kaliningrad)]。在他几近八十岁的漫长人生中,除了偶尔到紧邻地区旅行外,他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里。由于贸易繁荣,18世纪的科尼斯堡是一个非常活力的城市。通常情况下,它绝不可能与世隔绝。康德也绝非一位隐士,他喜欢社交生活与智识性的交谈。他与科尼斯堡的商人们交好,也包括一些英国人在内,其中的两位——格林 (Green) 和马泽白 (Motherby) ——是他极其亲密的朋友。尽管一丝不苟地严守生活习惯,并守时到挑剔的程度,但他仍然是一个文雅和风趣的人。

康德的父母并不富裕。他的父亲是一个住在科尼斯堡的马具工匠。他的家庭属于虔信派 (Pietism) ——一个强调笃信的感情和发展内心生活的新教运动派别。家庭的虔信主义气氛在童年生活中影响了他性格的塑造,他母亲朴素的虔诚尤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父母早亡之后 (母亲死于1738年,父亲死于1746年),康德与其家族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

康德杰出的才智得到了学校的认可，这使他能够进入柯尼斯堡大学读书，在那里他仍然很优秀。1755年，他被授予硕士学位兼无薪编外讲师（Magister legens or Privatdozent）资格。这就是说，他没有薪水，只能靠课时费来赚取收入。由于他的讲座非常受欢迎，再加上授课很多——至少一周20个小时——他就能稍微补贴下贫困的生活。他教授很多科目——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法律理论、地理学、人类学，等等。他开始通过撰写著作获得学者和科学家的名声。在1755年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General History of Nature and Theory of the Heavens*）一书中，他提出了关于宇宙起源的一个极具原创性的主张，这与稍后被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详述的那个理论类似，现在它被称为“康德—拉普拉斯”理论（“Kant-Laplace” Theory）。康德因而通过讨论自然科学问题开启了他的学术生涯，即他致力于在哲学上证明牛顿的科学体系——此后这一尝试成了他批判哲学的起点。但直到1770年被任命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席之时，他才在经济上立足。当他的名声远扬之时，他的薪金也获得了可观的增长。他还一度成为了学校的负责人（Rector）。 2

康德的讲座富于启发性，很有影响。他的学生被其观点的原创性和生动性打动了，而这些观点还带有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幽默。

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作为一位哲学家，他真正具有决定性突破的著作是1781年发表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对他而言，这部著作在思想界发起了一场堪与天文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相媲美的革命。接着，以较快的速度，其他的重要著作也出版了。

1793年出版（1794年第二版）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

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冒犯了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克·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而这位国王[与他的先人弗里德里克国王(Frederick the Great)相反]在宗教事务上并不奉行宽容政策。弗里德里克·威廉二世命令他昏庸的大臣沃尔纳(Wöllner)写信给康德,使他承诺不再撰写关于宗教的著作。^[1]康德勉强地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从而引发了一道国王命令的下发,其中含蓄地证实了他的承诺,即作为陛下最忠实的臣民,他将不再撰写有关宗教事务的著作。国王死后,康德认为这一承诺对他的约束已经解除了。他解释说,正如“陛下最忠实的臣民”^[2]这个短语所暗示的,他的义务仅仅适用于弗里德里克·威廉二世的一生。他还说在《学科之争》(*Contest of Faculties*)^[3]的序言里就已经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在这篇序言中,他以暗讽的手法反击了此前一年去世的弗里德里克·威廉二世。

康德对他的这个决定明显不能释怀。在一篇未发表的笔记中,他解释了自己的行为:“一个人对其内在信念进行抵赖和否认是邪恶的,但是在目前的事态中保持沉默却是一个臣民应尽的义务;尽管一个人必须说真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开说出所有的真相是一个人的义务。”^[4]

3 康德逐渐从大学退休了,他的头脑慢慢衰退了,记忆力也减弱了,因此他不得不放弃教授课程。1800年,他的学生

[1]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克·威廉二世内阁命令,1794年10月1日,见AA VII,第6页;AA XI,第506~507页。

[2] 给弗里德里克·威廉二世的信,1794年10月12日,见AA VII,第7~10页,尤其是第10页;以及AA XI,第508~511页;也可参看AA XI,第508~511页,尤其是第511页;也可参看AA XII,第406~407页。

[3] AA VII,第7~10页。

[4] AA XII,第406页。

瓦斯安斯基 (Wasianski) 不得不开始照顾他。其他学生开始出版他们在笔记中记录下来的讲座内容。1803年, 他第一次感到病得不轻。他的思维越来越模糊了。最后, 他于1804年2月12日去世, 而再过几个月就是他的80大寿。

二

通常, 至少在说英语的国家, 康德不被当成一位重要的政治哲学家。诚然, 政治思想史没有给予他适当的荣耀, 如果提到他, 也只是顺便而已。然而, 政治思想史学者忽略他只不过是自担风险。最常见的是, 他仅仅被看做黑格尔的前辈。这种忽略和误解的原因不难发现。之所以哲学史学者, 甚至是康德研究者, 忽略他的政治著作, 是因为他的三大本批判的哲学观点几乎完全攫住了人们的注意力。政治思想史学者很少注意他, 是因为他并没有写过一部政治领域的专著。《权利的形而上学要素》(*The Metaphysical Elements of Right*) 更能引起法学史学者而非政治理论史学者的兴趣。而且, 他批判哲学的伟大著作是如此地位崇高, 使他的不完全意义上的政治著作反而显得不太重要。这也加深了这种想法: 它们并不是他思想的核心所在。然而, 这种看法是极端错误的。尽管深入这些政治著作去获知康德思想的目标有些过头, 但它们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它们确实是源自他的批判哲学而有机地发展出来的。事实上, 康德曾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家。^[1] 康德哲学的精神确实与法国和美国革命

[1] 参看海涅 (Heine) 著、恩斯特·埃尔斯特 (Ernst Elster) 编:《著作集》(Sämtliche Werke), 莱比锡与维也纳, 日期不详, IV, 第245页; 也可参见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历史批判文集》(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法兰克福/美因, 1927年, I, 第254页。

的理念类似：因为康德在权威面前力挺个体的独立，而且人的自由问题也是他思想的核心。相应地，1776年和1789年的那些革命也相信它们是在尝试实现人的权利。此外，美国和法国革命中的事件也令他非常激动和着迷，革命的目标也引起了他的同情。他确实如此，尽管他性情保守，拒绝承认

4 进行政治上的革命是合法的行动原则，而且他一定不支持他的祖国普鲁士发生革命，但是正如1784年的文章所显示的，早在1789年之前，他的政治态度就已经成型了。可能法国大革命刺激了他继续在这个主题上进行写作。但卢梭（Rousseau）的榜样和影响也一定不容低估。卢梭教导他要尊重普通人；^[1]他对康德而言就是道德领域的牛顿^[2]。卢梭的肖像是他房子里唯一允许的装饰，而当他阅读《爱弥儿》（*Émile*）时，他甚至都忘记了例行的午后散步，据说这是他唯一一次偏离像钟表一样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在很多情况下，康德的观点非常接近法国革命家的雄心壮志，不过他永久和平的愿望比他们走得更远。从此他继承了被莱布尼茨（Leibniz）与圣皮埃尔神父（the Abbé de St Pierre）首先提出的观点，不过却以一种新颖的、原创的、在哲学上严格的方式发展了这些观点。

如果将康德哲学与18世纪两次主要革命中的观念联系起来是正确的，那么康德政治思想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因为美国和法国革命构成了与过去政治之间的公开决裂。为了发动大规模的政治行动，人们诉诸世俗的自然秩序和个人的政治权利。当然，革命是由美国与法国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环境所引起的，但革命家们的信念却并不是一个用来误导公

[1] AA XX, 第44页。

[2] 同上, 第58页。